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解放理论批判^{*}

韩秋红

【内容提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生态危机为切入点，形成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总批判：一是要求以生态保护为动机的生态-社会理性对以追求利润为动机的经济理性进行管制，实现社会精神与社会秩序的生态重建；二是要求观念变革，自觉抵制消费异化现象的滋生与蔓延，对资本主义社会制造的虚假需求与控制自然观念进行拒斥；三是主张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践方案，提出生态危机背后深层的生产关系矛盾之本质问题，倡导环境保护等新型社会运动。我们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解救之路的分析批判，具有理论价值，但也有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体现在其“二分法”的对立思维、“主观主义”的哲学理论传统与“中心主义”的分裂致因。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资本主义批判 解放理论 生态文明

作者简介：韩秋红（1956-），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长春130024）。

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兼具批判与重建的理论路向，以对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揭示与内在原因的批判为要，思辨资本主义危机之出路为标。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面向资本主义现实与回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统，就如何解决资本主义严峻的生态危机问题进行了理论与实践探索，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但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解放理论仍然有着不可克服的内在局限。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论述的三条解放道路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进行现实性揭示与批判性分析，指出工具理性在当代体现为更加彻底的经济理性形式，并要求生态-社会理性的崛起与制衡，重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方法对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现实适用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以解放为核心，在对经济理性展开社会批判、对观念世界进行变革以及对社会实践提出针对性方案的三条路向上，对当前反思生态问题提供了启示。

1. 从经济理性批判到生态理性超越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敏锐地捕捉资本增殖逻辑的反生态性本质，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花最少的成本生产出最大限度的交换价值”的“生产逻辑”必然造成自然资源开采过度、生产过剩、浪费现象普遍等社会现实问题。资本逐利需要消耗越来越多的商品和服务，又需诱使消费量的增加和市场消费需求的扩大。对于资本主义将“多”视为“好”的“生产逻辑”，法国左翼思想家安德列·高兹认为，这是具有利润动机的资本主义社会与具有生态保护动机的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根本

^{*}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新进展研究”（20JZD008）的阶段性成果。

对立，反映出经济理性对生态理性的全面压制。在他看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实现生态理性对经济理性的反制，即努力发动“限制经济理性的肆意拓展，使经济理性再度服从以伦理要求为基础的社会约束”的社会主义运动，“使个人摆脱限制个人充分发展与自由的市场、竞争和利润逻辑桎梏，获得解放”^①。MEGA2 编者和研究专家斋藤幸平认为，作为一种自然力量的人类劳动对自然的物质进行改造，而在改变外部自然的同时人类劳动自身也发生变化。但是，这种相互作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采取了破坏性的形式：资本对自然的利用程度已经使自然界的新陈代谢混乱，难以维持自然界的正常运行，甚至阻碍其运行。在此，斋藤幸平同样看到了经济理性制裁生态理性的窘境。

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两个方面的对立来认识启蒙理性的弊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之延续为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对立，充分认识到理性内部两个对立面的分化与彼此不平衡的异化状态，工具理性或经济理性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也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口诛笔伐的主要对象。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无限生产与无限交换价值，使得“人化自然”以及人本身都被工具化、手段化地化约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体系中来，使之成为丧失自然本质与丧失人类本性的异化存在。并且，在经济理性的宰制下，这种异化只能被不断加剧：空气、水、矿石等自然环境被商品化，胎儿、器官被工业化，在基因工程中让每一个细胞都功能最大化，等等。资本主义经济理性促成“新奴隶主义”的出现。这与“启蒙倒退成了神话”何其相像！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出解救当代生态危机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生态理性对经济理性的反制，主张必须摒弃经济理性，用主张“少而好”的生态理性反制无限积累、无限扩张的经济理性，形成“生活得更好但劳动更少、消费更少”的社会，通过生态理性自觉，降低经济增速，克制消费，使经济理性服从生态理性，实现生态重建。

2. 从文化批判到生态意识自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消费异化角度展开资本主义大众文化批判，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再生产全过程，尤其在消费领域表现为严重的消费异化现象。所谓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②。资本主义的异化消费改变了人们的劳动观与消费观，改变了个人的需求方式，也形成了所谓新型财富观。但同时也销蚀了个体的批判性、创造性、自主性，致使劳动阶层成为一个失去反抗意识、批判意识、阶级诉求的阶层，依附于消费主义及其观念。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给出了观念革新的解放道路，认为摆脱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关键离不开社会生态观念的普遍确立。一种是走社会观念自我运动的自在更新道路。阿格尔“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认为，对于生产生活的社会评价标准及观念是可以在辩证运动中自我扬弃的，即对于消费异化现状，只要新的生态型的需求与消费观念取缔虚假需求的消费观念，消费异化所带来的生态危机及社会危机就会迎刃而解。另一种是走通过一定方式与手段实现社会观念向生态文明整体转变的自觉更新道路。如莱斯、休斯、格伦德曼等人通过重释“控制自然”与“支配自然”等观念，对其进行伦理道德界限的赋值，使该观念不再借科学技术的中介对生态与社会造成破坏性影响，而是将控制自然的任务从自然界转向人自身，即控制人的欲望及其破坏性，解放自然亦解放人性。这条“自然的解放”之路，意味着控制人自己的欲望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

① [法] 安德列·高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彭姝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58页。

② [加] 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94页。

3. 从观念变革到政治实践运动

生态社会主义努力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阈探寻生态危机内在的生产关系问题，以谋求现实的生态解放道路。

奥康纳试图以双重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和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的矛盾）及双重危机（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的理论观点，实现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修正”式“重构”。其认为资本积累过程严重损害了公共生产条件，造成生产规模无限扩大与生产条件承载力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导致严峻的生态危机及社会危机。但奥康纳也指出，更大问题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而非生产方式本身：“首先是社会政治及意识形态的问题，其次才是社会经济的问题。这是因为……生产条件（与生产过程本身不同）在本质上已经被政治化了，通达自然界的途径被各种斗争所中介，外在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政治身份及主体性处于缺失的状态”^①。奥康纳试图通过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政治-经济、社会-自然——提出自己解救生态危机的方案，即通过新型社会运动促成社会政治力量的平衡状态，实现“生产性正义”的资本主义改良方案。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中从另一角度指出，资本主义的第一个矛盾指涉一种寡头垄断的趋势，寡头垄断掩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因为它通过土地私有化并将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所有生产来源转化为商品而被迫与自然疏远。因此，福斯特认为，自然资源获取的身份权限已然限定为“巨头大亨”，这些巨头大亨反过来加剧了资本主义的第二个矛盾，因为他们倾向于以牺牲生物体的自然循环为代价来积累财富和利润。资本要求越多，其对生态的破坏度越大。资本主义霸权体系被生态社会主义者视为所有生态危机的根源。这意味着，要解决生态问题，首先需要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两个相互矛盾的因素：寡头垄断和寻求利润的经济学，唯有超越这两方面才有可能敞开一种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空间。

如何实现这一改良方案，在奥康纳、福斯特等人看来，离不开新社会运动在政治斗争中对生产条件使用权的争夺及使用方式的重整。“资本是否能够以其所需的质量和数量要求、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获得原料、所需的技术性劳动力以及有用的空间及基础设施的构型，要取决于以下这些因素：资本的政治力量、对生产条件的特定的资本主义形式进行挑战（譬如，在把土地当作生产资料还是消费资料的问题上的斗争）的社会运动的力量、对生产条件的使用及界定问题上的斗争进行调节或审查的政府机构（譬如，对城市进行分区制管理的委员会）的作用等等”^②，这样，问题就演变成如何平衡这些现实存在的政治力量以达到对生产条件的合理运用，实现生态正义的经济秩序，而不再是以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目标进行彻底的、现实的改变社会生产方式的革命问题了。因此，当生态社会主义者把当代资本主义称作“政治资本主义”时，其关于超越该资本主义形式的“社会管控及合法性的新形式”的生态社会主义构想只能作为“乌托邦”而存在，即生态社会主义方案具有的乌托邦性质尽显无遗。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解放方案的局限性及其批判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发展至今所取得的社会现实效应甚微，原因在于其理论主张内在固有的局限性。

① [美]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5页。

② [美]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4页。

1. 破除“二分法”的对立思维，坚持以矛盾对立统一方法认识理性与危机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矛盾的对立面有清楚认识，同时强调对立面不可分割的联系性，矛盾的统一性体现为对立面之间相互吸引、相互转化的趋势。如果理性内在具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分，或由此演化而来的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之别，那么，二者的关系也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正因如此，在现代生产力条件下，我们所强调的是实现两种理性之间的平衡，共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而非要求一方对另一方的全面压制。以矛盾对立统一方法对待理性的这种划分及其相互关系，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中存在，却并不彻底。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提出对启蒙进行再启蒙，要求对神化了的启蒙理性进行新启蒙理性解放的理性自救路径，其中内蕴深刻的辩证法原则。但每当面临严峻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危机，反思理性之弊时，一种“二分法”的思想残余却经常体现。如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里，从关于“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成政治的合理性”^①的判断，到“经济理性是一种彻底的工具理性：不仅所使用的手段与要实现的目标不一致，而且目标本身也是资本增值的手段”^②等认识，虽揭批了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加剧的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全面压制状况，但同时也反映出其在理论态度上日益偏重于对经济理性的反对之中。

尤其当面临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甚至将生态危机提至社会主要矛盾的地位上来，“历史的变化已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由于不能为了向人们提供缓解其异化所需要的无穷无尽的商品而维持其现存工业增长速度，因而将触发这一危机”^③。在一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社会历史现实状况已经发生本质改变，生态危机已取代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异化消费已取代异化劳动来统治现实。因而他们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已经过时，从资本主义异化中解放出来的历史任务在当代已交由生态危机理论处置。由此，使其将解放之钥寄于生态危机的解决之上，用生态解放取代社会解放成为其必然得出的推论。用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的判断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二分法”的思想特征，没有认清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的内在关系，将二者以对立的方式分别视为社会危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呈现方式，以表象上烈度更强的危机形式代表社会本质的危机所在，主张用环境保护运动排解生态危机，同时使得其他危机迎刃而解，带来人类生态文明的进步。这一“美好图景”只停留在表象层面，缺失全面的、历史的、现实的看问题的辩证思维，这决定了其在具体解放路径的落实上也难有实践可能。

2. 破除“主观主义”哲学理论传统，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原则解读生态危机的现实出路

马克思主义坚持对一切不切实际的哲学传统进行彻底清算。马克思通过批判用幻想遮蔽现实的宗教神学，批判一切唯心主义哲学。马克思对启蒙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人自由运用理性能力的发掘是持辩证肯定态度的。但是，马克思在进一步批判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与其后出现的青年黑格尔派等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关注德国现实方面的毫无作为时指出，“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④，鲜明批判体系哲学、思辨哲学的不切实际，明确要求改变世界的哲学出现。马克思与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划清界限，同样以强调哲学与现实的联系为根本要求，以强调兼具客观现实性与主观能动性的人的实践活动为立论原则。通过对以往一切旧哲学特别是唯心主义、

①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7页。

② [法] 安德列·高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彭妹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52页。

③ [加] 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8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5页。

主观主义的清算，马克思建立起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以此为出发点反复强调“从当下国民经济的现实出发”，考察的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及其“现实生活过程”本身。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对社会劳动、异化劳动、剥削关系等社会客观存在的事实，进行从现象到本质、从主观到客观、从理论到实践的理论批判与实践超越中，形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彻底批判。因此，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立足于社会存在、社会现实，承认理性解放的历史意义，批判思辨理性不切实际的抽象幻想。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承继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直面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问题，对我们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也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关系批判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传统的延续。但遗憾的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并未超越这一思维逻辑，仅在工具理性的程度性变化上形成新的概念总结，用生态理性的“词句”与资本主义展开斗争，或者将希望寄予观念的自我革新上，回到黑格尔绝对观念自我运动的逻辑体系中求解当代生态问题的观念变革道路，仍具有鲜明的“主观主义”倾向，有悖于其学派名称中所包含的“马克思主义”。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①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与革命性集中体现在对人类社会历史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特殊规律的实证性分析与实践性运用上，即在社会历史领域贯彻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与观点，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超越于以往一切旧唯物主义的革命性所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围绕消费异化展开的大众文化批判及其观念革新道路并未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高度。“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②。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现实出发，要求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状况，实现人、自然与社会的真正解放，批判以社会观念变革的方式寻求社会解放的思辨路向。因此，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改变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本办法是以实践革命的方式促成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变革与创新，而非用口号呼唤观念的转变，而非用“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等）代替问题的解决，而非用幻想昭示实践的成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恰恰在解放道路上缺失了理论的现实性与社会的历史性。

3. 破解“中心主义”的分裂致因，以历史唯物主义认识生态社会与工业社会的关系

缺乏理论共识与共同体意识也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解放道路上难有实际建树的重要原因。造成同一思潮流派内部存在难以弥合的分裂问题之原因在于“中心主义”的自我立场。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内部存在立场鲜明对立的奥康纳阵营与福斯特阵营，两大阵营针锋相对、争论不休，难以形成共同体力量，严重妨碍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社会影响力。再如，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的争论也常见于包括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环境理论思潮中。“深绿”思潮多强调“自然价值”理论（罗尔斯顿）、建立人与非人类生命平等性的“自然契约”概念（米歇尔·塞尔）等批判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范式的主张；“浅绿”思潮批评片面排斥经济增长和技术革新的自然中心主义范式，如格伦德曼力图树立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赋予“支配自然”以积极的含义，重构历史唯物主义，提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阐释和解决当代生态问题，开创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且二者之间也难于达成共识。即便“红绿”思潮提出把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所承载的价值观看作生态危机的根源，提倡培育共同体价值观和建立市场社会主义作为解决生态危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4、155页。

的出路，但也常因其价值立场是非西方中心主义而被持西方中心主义立场的群体所拒斥。显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内部各分支有局限于只认自我体系建构的中心主义之嫌，而难于在共识中切实推动生态危机的实质性解决与生态运动的积极发展，无法从根本上动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建立新型生态文明社会。

“要真正克服当代的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就必须超越或走出各种形式的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走入以人类整体的、长远的利益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价值尺度的人类中心主义，亦即必须坚持以人类整体作为价值本位。”^①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生态文明不是独立于工业文明而单独存在的某种观念集合或历史方案，而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历史地看，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② 对于社会发展而言，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对于生态社会与工业社会的关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持的基本认识是前者取代后者，如此一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即暴露出二分对立的思维方式而无法理解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生态社会与工业社会的关系，将社会历史的发展视为可以凭借自我意识的能动设计而提出的一种“方案”，在社会历史观上重陷唯心主义窠臼。

实现真正的社会变革与人的解放要求以消灭私有制为目的的与实践运动，而非以社会制度改良为出发点与落脚点的乌托邦方案。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只有切实改变社会存在，才能使社会意识发生转变。对于无论是生态危机，还是文化危机，抑或社会危机等各种形式的危机，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不是别的什么政治意识、文化观念，后者作为社会意识是受社会存在决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本在于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

三、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方案的应时性与超越性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生态危机维度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在解放道路上虽提出一些有益的思想主张，但由于缺失现实可能性与实践革命性，使其思想理论的影响力不够广泛、现实实践的效应不够鲜明，且暴露出自身的内在弊端。一是过高判断了生态危机的地位，试图经由生态解放博取人类解放，有消解唯物史观的理论偏颇；二是存在明显的共识难题，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内部各分支有局限于自我体系建构的中心主义之嫌；三是对社会历史变革的主体力量认识不够明确，仍然主要局限在知识分子团体内发挥论辩影响力。由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与方法的贯彻不彻底，使自身在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过时”的同时，也将自身推向了“非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行列，这启发我们思考何种生态解放出路才是马克思主义解放理论的真义。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性蔓延及其带来的连锁效应，以及日益深重的全球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的现实问题在 21 世纪的凸显，从关乎全人类生命安全与种族存续的迫切问题出发，追讨资本主义尤

① 汪信砚：《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论审思》，《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3 期。

②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第 6 页。

其是新自由主义对自然与人类社会剥削压榨的负债，追问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发展的科学方案与有效出路，成为当今时代的核心话题。有西方学者鲜明地指出：“资本和未来只能二者选其一。若我们选择了后者，那么资本主义就必须被废止或者用另一种生态友好型社会制度来替代。”^①但是，如何替代，以怎样的立场与态度看待生态型社会的建设与发展，亦即面对生态危机，到底什么样的解放路径是科学的，成为生态批判理论的旨归所在。对此，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给出时代回应。

1.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实事求是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与西方中心主义的生态理论以追求生活质量为导向不同，中国的生态文明理论具有以追求在生存和发展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导向的特征，这是由当前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现实所决定的。当今，贫困已然成为全世界需要共同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解决贫困问题时，如何兼顾经济效益与生态保护，如何有效防止工业生产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是选择先发展后治理的传统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还是选择在发展中有效治理，都是当代世界多地亟须解决的重要社会发展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在极为特殊与困难的2020年，一方面努力克服疫情影响而大力发展经济，并与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有机结合，另一方面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使中国7亿多人摆脱贫困，为世界解决贫困问题提供重要经验。

“数量增减、简单重复，是形而上学的发展观”，“我们要的是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②。可持续发展不是在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中择取其一，而是深刻认识到二者的内在一致性：“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通俗地讲，就是要‘两座山’：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这‘两座山’之间是有矛盾的，但又可以辩证统一”^③，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④。因此，“经济发展不应是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应是舍弃经济发展的缘木求鱼，而是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⑤。

2.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两个必然”是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但实现“两个必然”、从资本主义私有制中解放出来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长期过程，是通过人、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的长期过程。其中，人是解放的唯一目的，也是唯一手段。因此要求理论必须通过掌握群众转化为物质力量，推动社会历史发展进步。作为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生态文明绝非一个转变社会道德观念的问题，而是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发展问题。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是人民群众。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实现社会变革必须具备生产力与革命群众两个必要因素：“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

① [美] 乔尔·科威尔：《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毁灭？》，杨燕飞、冯春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1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34页。

③ 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86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09页。

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9页。

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①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社会主义运动及其他当代社会的劳工运动、女权运动、环保运动等社会运动形式非常重视并积极赋能。虽然社会亚群体的形成与利益诉求形式能够一定程度上代表人民群众的需求与呼声，但亚群体的社会运动往往以本群体的利益诉求为目标，并不具备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革命性。只要处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在利益或需求方面给出一定的承诺与满足，其街头游行、巷口抗议就会被压制下去。这种妥协性不仅不能根除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且极易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统治的工具与同化的对象。因此，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坚决将人民群众作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依靠力量和核心作用对象，“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②。

3. 具备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事业的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中向“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进阶。“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③，即要求摒弃一切割裂性的思维方式，根据各自实情，为了共同福祉共同而有差别地发展。不能以自然解放类推社会解放，以观念解放换取现实解放，以生态解放实现人类解放的表象逻辑理解人的解放运动，而应站在现实的人的解放高度整体认识资本主义固有矛盾，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在现实的生产生活方式变革中历史地完成关注绿色生态的人类文明进步。如果从共产主义视角认识生态文明社会，则要求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向共产主义价值观靠拢，为共产主义运动做出物质条件与精神条件的准备与加持。因此，生态文明社会将成为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又一阶段性胜利。

从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以及各种危机中解放出来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在整体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长期过程。这一解放只能通过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才能实现。社会历史发展与人的解放只能依靠现实的人的实践力量。生态文明不仅意味着人与自然关系和解的生态维度，更重要的在于人类社会文明形态的整体进步，即人的解放事业的历史性发展。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年。
- [2] [英] 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
- [3] 王雨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 [4] 陈学明：《福斯特：消除生态危机必须丢掉幻想》，《哲学研究》2011年第11期。
- [5] 郁庆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视域下的生态文明史观》，《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3期。
- [6] 韩秋红：《共生与共谋：生态危机与精神危机的现代性批判》，《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0年第5期。

（编辑：张 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3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14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24页。